上海知青“周电影”

□范干平

正是江南明前茶上市时,3月31日,黄浦江畔,我正陪同和参加贵州省领导同志在上海主持的贵州茶叶门店揭牌和推荐系列活动。傍晚时分,手机轻轻地响了一下,打开一看,是好友发来的短信,短短一句话,于我而言不啻一声惊雷:紫云知青、好友周志伟去世。我抬头远望,浦江上细雨迷蒙,对岸陆家嘴中心众多高楼大厦半遮半掩,我的双眼也如同江上楼间的雨雾一般。

渺渺茫茫之中,我仿佛看到身材不高、体态微胖,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把精致小梳子的周志伟正艰难行进在麻山山区崎岖的山道上,他的身后是一匹棕色的贵州特有的山地马,马背上驮着发电机、放映机和一个硕大的帆布口袋。虽然山路崎岖、路途漫长,汗水湿透了周志伟身上的衣服,但是他的头发却始终一丝不苟。大山背后,深山里的村寨近千人翘首以待晚上精彩的电影盛会。在众多观众面前,周志伟很注意形象,即便是现在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艰难行走,他也没有忘记掏出口袋里的梳子梳理梳理自己的头式,同伴笑他、赶马的老乡不理解甚至有点惊讶,我却认为,周志伟的这一习惯源自于他的家乡、源自于海派注意形象的特征。

周志伟是来到紫云众多上海知青中的一员,在这个喀斯特地貌高度发育的偏僻山区,虽然他当知青的生产队离开县城和公路不远,但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知青的生涯是艰苦的,是磨砺和考验,是由学生转换为社会人脱胎换骨的长途跋涉。在迈过了生活、语言、劳动关后不久,1970年,周志伟报名参加民兵营,前往平坝县,参加三线工厂基本建设。1971年,他由紫云招工,直接从建设工地抽调回县城,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要知道在当时,这是有工资、有户口本、有粮油供应,可谓旱涝保收的工作,何况在县城还有了一间住房,哪怕是小小的一间,与当知青相比已然天壤之别,因此让同在工地的其他上海知青们羡慕不已。

周志伟参加工作后成了一名农村放映员,工作对象就是全县的村村寨寨,艰苦、寂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常态。

紫云自治县南北长76公里,东西长52公里,上世纪70年代时下辖6个区、37个乡镇、约230余个生产大队(现称为“村民委员会”),送电影下乡的岁月,周志伟到过其中大多数生产大队,是全县干部职工中到达生产大队数量、次数最多的人之一。

长期的黑白(白天、晚上)颠倒,宿在百家、食于千户,不规则的生活,面对热情的乡亲,大口吃肉(其实更多的是杂菜)、大碗喝酒渐渐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个年代的酒,清一色自酿,土酒度数低,尽管谈不上质量和口感,但是每次喝的量很大,这一切为他日后的健康埋下了隐患。行走、工作在紫云的山山水水,零距离生活在苗族、布依族、汉族兄弟姐妹中间,他和他的伙伴们为广大群众带来了饕鬄电影大餐和莫大的欢乐,同时,自己的工作和社交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是一位偏僻山区文化的传播者。

上世纪70年代初山区文化生活十分的枯燥,麻山地区偶尔一场露天电影,绝对是山村盛大节日,场景比过年还热闹。哪一个生产队要放电影了,早几天就会在周边几公里范围内相传,这几天里,人们见面说的最多的必定是电影,心里想的最多的是电影,最为期盼的仍然是电影。

等到放电影的这一天下午,人心已散,人们已无心干活,无论队长怎样干涉,下午的活准没法干到底。人们早早结束劳作,赶回家中准备晚饭、准备电筒、准备亮篙、准备板凳、准备草团,天还没有黑尽,就相约出发去看电影了。天黑下来了,方圆几里,火把像巨龙一般在山间游动,更像星星布满山间丛林,闪闪烁烁、飘飘忽忽,见首不见尾,目标一致对准电影放映场,那都是赶来看电影的人打着电筒、持着亮篙在赶路,人人兴奋异常,欢声笑语,煞是热闹,十分壮观。当知青的年代,我也和乡亲们一样兴奋的在黑夜里走十里、八里去看一场电影,哪怕是早就看过的,仍然期盼、兴奋无比。

临时作为电影场的晒坝坐满了人,不少人来自很远很远的山寨。直到很多年后我仍弄不明白,山里消息闭塞,既无电话又没有其他通讯手段,放电影的消息何以传得如此快。

那时节的电影无外乎就是《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枪声炮声,打得一塌糊涂,这符合农民爱热闹的心理,只要打得激烈、热闹就行,内容、情节如何与观众们没有什么关系。然而难得的一场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而且往往不止一次,而且往往难以修复,而且往往令人十分沮丧,这仿佛已经形成规律。每到故障发生,人们先是安静等待,继而不耐烦、最后话语就不太好听了,起哄、责备、骂骂咧咧。灯光下,放映员忙得满头大汗,既要管发动机,又不放心放映机,可是越忙越见鬼,到最后不得不宣告明天再见。于是人们叹着气、摇着头,极不情愿的离开,不少人发誓从此不再看电影。但是明天这个时候,不约而至,大家一定会再次来到电影放映现场,哪怕是再次面临昨天的尴尬。一场电影往往要用二、三个晚上才能放完是经常性的,如果一次成功,不少农民兄弟姐妹甚至可能会感到不过瘾。我体会,在不少村民心中,其实电影场是一个社交的好地点、好时间,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

周志伟却不是这样。跋山涉水来到村寨,他不会因此先休息休息或者睡一觉缓缓神。一到队里,他不是检查发电机、放映机就是倒片、挂幕布、检查电路,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准备充分,他放电影故障少,即便是发生了故障,他也能及时排除。因此,只要听说周志伟来了,悬在大家心中的石头就落地了。他技术好,为人和气,整天笑嘻嘻的,因此电影一散,总有不少人主动帮助他下银幕、收拾机器。

电影放完了,群众心满意足的走了,放电影的却将开始另一个重要活动——吃宵夜。

那年代生活艰苦,尤其是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食材招待人,但是无论如何,村子里总有几个热心人,一定会设法宰个鸡弄点土酒招待放映员且百分之百出自于内心,周志伟肯定是最受欢迎的人,招待他,大家真正的心甘情愿。每到这个时候,周志伟也是喜形于色,脸挂满了笑意,何况他本来就为人和善,笑颜常驻。几口土酒下肚,得意之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往冒着热气的铁锅里倒出些许白色粉末,众目睽睽之下,他交代众人赶快尝尝味道怎样?于是大家小心翼翼的拿着筷子,夹起一点菜,放进嘴里,果然不同凡响,味道鲜美无比,与刚才截然不同。大家眼里充满了惊讶的光芒,周志伟用精湛的电影放映技术和一瓶小小的味精征服了无数山民,成为深山里人们茶余饭后口中的轶事、传奇。

长期的基层放映电影,他以上海人的精明、负责和娴熟的技术赢得了千千万万的群众的喜欢,人们叫他“周电影”,这既是群众对他亲热,更是对他的认可,久而久之,人们好像忘记了他姓甚名谁,见到他,开口就是“周电影”,他答应的既快又自然,于是,“周电影”很快就超过了他真实的姓和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紫云偏僻山区的农民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上海人叫“周电影”,并且知道他放映电影的技术了得,知道只要“周电影”到了,今晚就有电影看了,而且电影不会放一半就出问题,以至留下几许遗憾甚至“恨”意。“周电影”这一称呼,是县里广大山区群众对他工作的最好肯定,而周志伟的价值也在这个名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下乡放映电影的工作虽然艰苦,但周志伟却始终快乐、执着的追求并享受这一切,这是周志伟的宝贵财富,是他脚踏实地、深潜基层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年代众多基层干部工作的真实写照。周志伟适应并且喜欢这种环境、这种氛围、这种生活方式,在深山里,在农民兄弟那里他很开心、很惬意,仿佛他就是为了山区的电影而来到紫云的。

十多年过去了,新电影一部连着一部,国产的、香港台湾好莱坞的,让县城电影院门庭若市。紧接着录像放映厅也开始出现在深山外的乡镇和大一些的村寨,文化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亦或是人手不够,亦或是下乡放电影实在艰苦,亦或是农村体制发生了巨变,集体变成个体,没有了邀请放电影的发起者,而新的模式和思路尚未形成,仿佛一夜之间,下乡放电影成为历史。周志伟带着失落感,回到县城,成了县电影院的“官”:电影院副经理。

他的技术仍是一流的,但是我却发现,他的状态不太好,当官与他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吸引力不大,他通过努力争取到了继续在电影院放电影。但是与农民们分离,断了地气,当年在乡村中那种精气神没有了,以后很少见到他神气飞扬的样子。好在他有一位十分贤惠、能干的妻子,这位地道的紫云姑娘的优点弥补了“周电影”的所有缺点,加上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他的生活安逸、舒心。

他和妻子的弟弟、妹妹们相处得很好,与岳父岳母相处得同样很好,全家把“周电影”这个外乡人视为家乡人、亲人,这种氛围甚至惠及到“周电影”的上海老乡。在紫云工作的日子里,我经常受他岳父岳母和他的邀请,在他岳父家喝酒、吃饭。围着火盆,面前铁三脚架上的铁锅里鸡渎豆腐“突突”翻滚,瓷碗斟满了包谷酒,爷仨直喝得脸红发汗。对于“周电影”的小日子,紫云上海知青们十分的羡慕,作为紫云人的女婿,他在县城生活得很舒适,且经常可以在县城红白喜事场合见到他,此时,他口袋里已经不再有味精瓶,然上衣口袋里的梳子依然在,他的头式依然整整齐齐。

随着年龄增长和县域里大批知青老乡不断地离开,周志伟也动了心并成功调到江苏省太仓市工作。在那里,他仍然在电影院,干老本行,还担任过电影院所属的娱乐场的经理。

与紫云相比,太仓属于发达地区,更重要的是,这里与上海相邻,是江苏省离开上海最近的地方,不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回到上海市中心。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然后偕妻子一起回到上海与孩子团聚,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偶尔的老知青聚会则是周志伟最为开心的日子,而他是大家心目中的快乐元素。他参加了知青们在上海的每一次活动,人仍然微胖,头发仍然那样清爽、梳得一丝不苟。2021年3月31日,正是53年前紫云上海知青离开上海的日子,近百名老知青在上海近郊古镇邵家楼聚会,周志伟已经作好参加准备,并且准备出发前去理一次发,然周志伟失约了。我想,大概在大家聚会的时候,冥冥之中,“周电影”已经回到了紫云,正大汗淋漓地行走在麻山崎岖的小道上,背后是一匹健壮的马,马背上驮着放映机、发电机、一个帆布包……

塘约红

□陶兴明

(接上期)

塘约领头人,左文学印象

提起塘约道路,村民谈得最多的是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在塘约村,提到左文学,大家都很亲切叫他左二牛。由于长时间在外打拼,他见世面、长见识,好学上进,喜欢读书。小时候上山放牛时,他都要抱着一本书看,一来二去,左文学肚子里的墨水越来越多,成了村里的“文化人”。

2000年,左文学被选为村委主任,200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党支部书记。而那时的塘约村仍是省级二类贫困村。田种稻子,坡栽包谷,没有产业支撑,没有集体经济,更谈不上什么生机。身为村支书,左文学想,该如何为塘约谋出一条小康路?

这个从小就喝着塘约河水长大的汉子,他太熟悉这块土地。也许是他的父亲左俊渝在塘约当了30多年村支书的经历,他从塘约各个时期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要为塘约闯出一条路来,单打独斗是成不了气候的,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效益最大化。

“这个左文学确实不一般,政策熟悉、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敢说敢干、无愧‘左二牛’这个小名,身上还真有一股牛劲,答应回村领头做事后,就真的放弃木材生意,全身心投入到塘约村脱贫攻坚、同步小康工作中。‘五加二’‘白加黑’地拼命干,脸更黑了人更瘦了不说,实在挨不住疼痛必须要做胆结石手术都瞒着大家。‘失联’三天做完手术就回来了。塘约的嬗变,正是有了这位一心为公、甘于奉献、心系群众、勇于担当的领头人”。塘约村同步小康工作组组长谭美蓉说道。

2014年6月3日,7月15日连续两次的洪水袭击,共造成塘约村经济损失约800万元,灾后重建工作迫在眉睫。灾后重建工作千头万绪。为了有条不紊地全面推进灾后重建,塘约村不等不靠,边建设边向上级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道路恢复、房屋维修、农作物补植补种等各项灾后重建工作同步推进,一场灾后重建家园的战役迅速打响:维修群众房屋、重建道路、治理河道、调整产业,逐步推进,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村民邱明海说:“我们受洪灾后,村干部将我们安全转移到村办公室里,政府将我们安顿好,早上起来可以吃面条,中午、晚上吃饭,既有肉也有菜,一日三餐被安排得妥妥当当。现在村里又争取到了很多项目,被冲毁的路修好了、硬化了,被淹的田也种上了经济作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邱明海心中充满感恩。

村民彭光齐说:“过去大家争当贫困户、残疾人、争救济,吃补助,看见公家的东西就要,现在没有人愿意去争这些了。还有环境变了,以前路很烂,下雨天煤水都到膝盖,鸡场坝变成‘稀场坝’,买辆新车两年就跑报废了,现在路好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田坝边,从塘约到乐平不到5分钟。房子也变了,现在都穿上统一的‘村服’,更干净整洁了。经济变了,以前村集体经济主要靠卖集体林场和竹子,每年收入就3万块钱,村里受洪灾,村民集中到村委办公楼,但村委拿不出钱来补贴受灾村民。”

左文学告诉笔者:“当初搞发展,村民也怀疑我们,说这几个人,连泥巴都没沾过,怎么搞农业?所以,我们就白天使劲干,晚上加班干,机耕道修了32公里,几件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增强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以前村两委只有5个人拿工资,支书、主任、治安员、文书、小组长每年每人才300元,根本就找不到人来做,所以小组长大多年纪都很大,干事不积极,因为待遇差。后来集体经济发展了,小组长待遇提高了,每年可以拿到6000多元,也更趋于年轻化了”。

“政策执行上也变化了。全村所有的重大决策,都要村民代表按手印确定。村干部也改变不了,村干部的考核每户都要去的,由村民考评,100分要打,0分也要打。”

“为什么变?根本原因是改革,过去满足于填饱肚子,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快了,思想转变了,走集体化道路,通过发展产业带动村民致富,不是光靠政策支持,还要靠人的改变,思想素质的提高,村民创业热情的高涨。”

提起王学英,塘约村的人都知道她是寨子里最穷、最苦、最坚强、最勤劳的村民。8年前,王学英的丈夫因风湿性心脏病去世,给她留下的除了一亩五分地、十几平方米的危房外,还有近8万元的债务。那年,王学英35岁,最大的孩子不到十岁,最小的才一岁多。她没有改嫁,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

“那时候每天到镇上的工地当泥水工,别人60块一天,开给我只有40块一天,但不敢讲价,必须要做。”王学英说,“为了钱,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碰上搞运输的上货,也要上前去问,十几二十块钱,帮别人上一整车的货,从来没有想过委屈,只要人家给我活路做,就是我的恩人。”就这样,王学英熬了6年。

2014年洪灾过后,塘约村成立合作社,王学英第一个报了名,把家里的一亩五分地入了股,后来,村里又成立建筑队,她又是谷掰寨组第一个报名的。

“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大家都照顾我,帮我找活路,帮我谈工钱,在工地上也让我做轻巧的活。”王学英感激地说。从2014年王学英将土地入股,在合作社务工到现在,所欠的债已经还了6万多。

“王学英真的了不起。”村支书左文学说,塘约村最敬重的就是这种自力更生、坚强勤劳的人。

(待续)

邢江河畔

□王天锐

应邢江河畔人家的热情邀请,在春回大地繁花似锦的时节,踏上了大山里山清水秀的平坦坝子,绚丽的梦缠绵着绿水青山的富饶丰美,涛声依旧的弥漫开来,源远流长地流传久远。

在小城里生活工作多年,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经常相聚一起畅谈理想,憧憬着美好多彩的未来,大家有缘千里来相会,都是来自小城的周边,邢江河畔的朋友特别多,感情也最为深厚和质朴,同属民族兄弟姐妹越来越亲密无间,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勤劳繁衍生息。

车在平坦的山路上行驶,山峦叠嶂锦绣鸟语花香,远远的望见一个个村寨,一幢幢房子坐落相连,满坝的禾苗茁壮成长,清风吹来泥土的芳香,布谷鸟时远时近的鸣叫,若隐若现从梦中传来,一群群的白鹭鸟,站在离离原上草上,洁白无瑕的羽毛,挂满吉祥如意的阳光。

蜿蜒曲折的河流从原野中流淌而过,溅起朵朵洁白如玉的浪花而去远方,每一曲每一折都是绝妙段山水画卷,已申报成为名副其实国家湿地公园,这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深沉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从此养在深闺人未知的小家碧玉,终于纤纤细步走出人间世外桃源。

阳光从树丛竹林里映照过来,片片翠绿在时光中晃动摇曳,万丈光芒的灿烂阳光洒满水面上,波光粼粼的碧水轻柔地起伏跌宕,层层的波浪从河中央,涌向幸福的爱情彼岸,波涛中悠闲的野鸭子,红掌波清波的自在逍遥,白鹭划过优美的弧线,亭亭玉立在河岸上追逐。

清澈见底的河水,长满茂密的水草,在水一方优美动人的景致里,长长的水草飘逸水中央,舒展柔美的身躯,妖娆的舞蹈起来,成群结队的鱼儿,从水草中穿梭而过,自由自在吐露气泡浮出水面,映照着绚丽多彩的光芒,岁月的风风雨雨,已将鹅卵石磨得光滑透亮。

两岸的凤竹婆娑繁花点点,山清水秀的古木参天翠绿,凉爽的风从天边吹来,清清的河水涌向岸边,艳丽的水鸟站在碧绿的礁石上,眼眸注视着岩石下游走的鱼群,展开羽翼飞过宁静的水面,深深扎进清水里追赶透明的鱼群,泛起阵阵璀璨的涟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远方的歌唱响彻云霄,白云朵朵游走远方,布谷鸟深深地鸣唱,播下爱情播种希望,骑在牛背上的天真少年吹响竹笛,在母亲低吟的呼唤声中回家,天空彩霞满天,流光溢彩灿烂。

春·绿 □苏萍 摄

虹山湖 副刊

安顺房山一线牵

□谢贵宁

近日,看到安顺与奥特莱斯集团共同洽商推动新奥莱贵州文旅康养产业项目落地安顺的消息。对于一个旅居北京的安顺人来说,看到这条新闻,仿佛看到了家里办喜事办大事。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上的奥特莱斯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光免费停车场就有2至3个足球场大,热闹得很!

房山区是北京的大西南,在天安门和雄安新区的中间,古代燕都的所在地,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但旅居于此的我经常感到怀念安顺,每每思及亲人们都在风景如画的安顺,一个电话就能欢聚,在安顺有多多的朋友、学生,数不清的熟人时,想念之情尤其强烈。

安顺和房山都是我热爱的地方。

有空时散步在家附近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课外活动时常听到学生们唱《读书郎》;小呀嘛小二郎,背起了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咯,无颜见爹娘……,多亲切的声音,好听好听真好听!这首儿歌是由已故的著名词曲作家宋扬于抗日战争的1944年秋,在贵州安顺西秀区汪家山苗寨创作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家乡安顺也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有一首歌是必唱的,这就是红色金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3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时年19岁的中国共产党员曹火星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毛泽东主席建议添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在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如今,这里有一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纪念馆。这支最动听的歌,会一直在北京在安顺回响。

安顺是故乡,房山也是故乡,她们会永远地牵着手。祖国处处是花园,祖国处处是春天,安顺美,房山美,牵手发展更美!

●办公室:0851-38118990 编辑部:0851-38118963 ●广告经营许可证:安工商字01103-0016 ●安顺工投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零售价:1.50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编号(520400001)